一位企业家的人生转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文出版社
主体110(2021)年

一位企业家的
人生转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文出版社
主体110(2021)年



宋大冠

（1912.8.29-1994.1.11）

序 文

常言道：“提笔容易挥笔难。”

我之所以提起笔来，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或者过人的文采。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记者来找我，跟我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听了他的话，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与其让别人听着我讲的故事写文章，不如我自己写真实的感想，即使写成拙劣之作。我还想，这世上关于母亲的文章很多，但是描写父亲的文章却很少。

这种冲动让我鼓起勇气，大胆地开始执笔。当时我心里想，我虽然没有什么文采，可是毫无虚构地、真实地写文章就可以了。

不过，把话说在前头。请各位读者别误会，我并不是为夸耀我父亲而写这篇文章的。

其实我父亲是一生为“钱”奔波忙碌的企业家。

“今日不做，明日晚矣。”我从小就听惯了父亲的

这句话。幼年时期在我眼里，父亲总是日夜奔忙、东奔西走的人。

这么一个为“钱”奔波一生的普通人、曾经的私营企业家，怎样成为爱国烈士的呢?

我想通过我的文章，把我父亲迎来人生大转变的故事公诸于世。

宋成姬

目 录

一、我的父亲

父亲从我小时候起就特别宠爱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闺女，还是因为我从父亲身上遗传了最多的基因，反正我父亲在七兄妹中最疼爱我，不管去哪儿都带着我去。

我慢慢长大，开始懂事以后，父亲老跟我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第一”“时间一去不复返”等值得我学习的格言。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讲给我听。因此，父亲的过去以及深藏在心中的“个人隐私”我懂得最多，甚至很多故事连我哥哥们都不知道。我说的“个人隐私”，并不是说我父亲隐瞒着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件或者杀人强盗行为。父亲绝不是那种藏头露尾、讳莫如深的人。他平时连钱包都不愿意带，能有什么秘密可言呢？父亲总是那么繁忙，来不及回头望，只顾眼前的工作和即将开展的工作，总觉得时间不足。

有些人以为我的父亲宋大冠是堆金积玉的企业家或大户人家的膏粱子弟，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身穿肥大的黑衲衣、脖子上挂着念珠，敲打木铎念叨“南无阿弥陀佛”的和尚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的故事应该从这里讲起，因为父亲的奇异命运跟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和尚的儿子

十九世纪中叶，朝鲜忠清道怀德郡一个贫农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孩儿。

虽然家境一贫如洗，但是新生命的出生和成长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岁月如流，不觉间这个男孩儿成了少年。然而，他们一家人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少年的父母溘然离世，只留下一男一女。

无依无靠的少年和他的姐姐开始了流浪生活。雪上加霜，姐姐也在路上死去，只剩下这个可怜的少年。他信步来到平安北道香山郡。身患疾病、营养不良的少年再也走不动了，浑身瘫软，摔倒在路边。这时路过这里的一个和尚见他快要死去，觉得很可怜，就把他带到了寺院。

这个少年就是我的爷爷宋京欢。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和尚。

光阴荏苒，当年的少年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

有一年春天，爷爷路过肃川郡长兴里的时候，觉得口渴，请一个正在泉边淘米的女人给他一碗水喝。她用白嫩的手舀了一瓢水递给爷爷。爷爷被她的花容月貌彻底迷住了。当年爷爷是63岁的老人。他不禁产生恋情，毅然还俗。重归尘世后，用积攒的钱买下田地和果园，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在他68岁的那一年，他们又生了个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宋大冠（生于1912年8月29日）。

人生暮年有了儿子，当时爷爷会是何等的高兴。他东奔西走，走遍全村，问邻居们有没有蜂蜜？看我爷爷到处要蜂蜜，人们咂着舌头问："你要蜂蜜干什么？又生孩子啦？"爷爷嬉皮笑脸，立刻回答说："是的，这次生了儿子啊。"

和爷爷一样，奶奶也格外疼爱我父亲，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命运有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吧。之前奶奶已经有三个儿子，但是她对这个跟还俗和尚生的老儿子的感情是很特别的。这或许还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就聪明过人。

我父亲一毕业于小学，奶奶就让他到离家很远的宁边去上崇德中学。可是过了三年后，父亲接到了奶奶的紧急通知：让他快点回来继承家产。

当时奶奶拥有一个果园。可是她前夫的孩子们把果园的收入都给挥霍在赌场上，所以她只好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于这个既聪明又老实的老儿子身上。

因此，父亲中止学业，回到老家开始做生意。四十株苹果树是本钱的全部。如何把它转换为钱，又如何用它赚钱，这是考验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的第一道关。

父亲极力反对那些只知道赌博的同母异父兄弟的叫卖式生意法，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他首先把从前销往新义州的苹果运到江界去，卖了双倍的价格。因为在江界以北的内陆地区，苹果是非常罕见的。物以稀为贵。

卖苹果的钱，他一分钱也不浪费，就直接向奶奶缴上去。我不知道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反正，当时奶奶天天在山路口等我父亲回来，望眼欲穿。一看到他带来的钱就大吃一惊，还追问是不是偷来的。

可我的父亲只是节约精神特别强、特别严格而已。

一路上他不去饭馆或酒铺，连一块烧饼都舍不得吃。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父亲是一个守财奴。为了个人的奢侈生活或者不出红利的事情，他不肯花一分钱。

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里的葛朗台老头在深更半夜里偷偷地从袋子里掏出金币，用手指尖弹起一块块金币，心满意足地聆听响声。这无疑是葛朗台老头的人生快乐。然而我父亲不仅刻苦赚钱，而且还很清楚这些钱该怎么花。（对此后面详述。）

父亲的第一笔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父亲可能是在赚钱方面才气过人。

此后父亲还着手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发生意，认认真真地打下了将来的著名企业家的牢固基础。

1935年我父亲和母亲（金泰福）的结婚，也为此铺上了一块儿垫脚石。我的母亲叫金泰福，是牧师的女儿。

我的外祖父金仁九曾经是年轻气壮的旧韩国军士兵，当过宫城卫兵。朝鲜军队被日本鬼子强制解散后，他在东平壤神学校读书，毕业后就当了牧师。

我母亲由于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所以举止安详、待人亲切。因为托父亲的福从小在闺房里平安无事地长大，所以她听了媒人的介绍，去看看父亲的家乡长兴里之后，就摇头反对了。她不喜欢偏僻的山区，更看不上一个买卖的。她想立刻返回平壤，却被父亲挡住了。通过此事可以看出我父亲的性格。他是一个一旦看上了就一气呵成的人。

企业家的机智和果断在这里也派上用场了。父亲阻止母亲说道：“咱们去平壤吧。你要是不喜欢这里的话，我也跟你一起去。把这里的农田和果园都卖掉。”

厚厚的嘴唇，黑黑的方脸……这个人怎么看也不讨人喜欢，可他那当机立断决定终身大事的男子汉气派犹如看不见的粗绳一样把我母亲绑得紧紧的。听说当时母亲什么也没说，只低着头用脚尖扒了扒地上的土。

我的父母就这样在平壤安家落户了。

我觉得他们的结婚故事和我爷爷的结婚故事很相似。

和尚的儿子和牧师的女儿——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子女携手并肩朝着企业家的目标进发。我一想起他们当日的平壤之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这样的感觉

怎么表达才好？真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家的话，能找到更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我的情感。

对我父亲来说，那天的平壤之行给他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他先在今日的平壤市大平区创办了一家碾米厂，然后大搞批发业。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钱也多了，人脉也大了，企业家的名声也成就了。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太平洋战争逐渐升级，进入白热化阶段。随之，日本鬼子对朝鲜人民的剥削政策日益残忍。鬼子为压榨朝鲜人民的血汗，甚至提倡“一滴油等于一滴血”，从蓖麻和松树中榨出了油。

父亲的企业也难免遭到鬼子的剥削，企业变得越来越衰退，父亲感到绝望。

就在这样的时候，祖国解放（1945年8月15日）了，父亲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国上下每天都载歌载舞，欢庆解放。满街都是游行的群众，高喊着“祖国解放万岁！”。

街上还时不时地召开集会、座谈会、露天大会等，演讲者都声嘶力竭地说新朝鲜要朝着什么什么的方向前进。不少人自诩为“英雄”和“爱国者”。有时候，

那些异己分子和反动派摇身一变假装成“爱国者”“革命家”，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喜悦也没持续多久。人们中间传开了一个可怕的风声：共产党将清算一切资本，不分你我地“共享”一切。不久，窃据“保安署长”“自卫队长”等职务的反动派威胁和恐吓资产家，甚至给他们上了手铐抓走。我父亲越来越疏远其他人。

还传开了跟我父亲很熟的医生李炳勋也被抓走的消息。其理由是他开办了一家私人医院，发家致富，又跟日本女人结婚，是一名“亲日派”。

因为早已传遍我父亲曾经经营私营企业赚了很多钱的风闻，所以他也不可能平安无事。果不其然，有一天监察科长（听说解放前他是平壤税务局的税务员）带着扛枪的人们来搜查住宅。

他威胁父亲说，把藏起来的黄金和资产账本都交出来，共产党不仅清算地主、资本家和亲日派，还清算私营企业家。

当时的确是一个混乱时期。虽说是解放了，但是秩序十分紊乱。

父亲非常焦虑，决定逃跑。他打算到南半部的汉城去经营企业。为此，他租了两艘机轮，装满水泥和糖稀出发，当然也带走了深藏着的金条。

他首先到了仁川港。在那里，父亲去找一个熟悉的企业家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召集人工，弄了一辆汽车，把货物和行李搬到了汉城。在汉城也有不少朋友或多或少地帮助了父亲。

可是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南朝鲜的美军政厅发布了通缉令，说我父亲转移了敌产。

多亏有个朋友帮助我父亲脱离了危险。父亲不得不藏在一个胡同里的阁楼。当时美军政厅以敌产的名义没收了很多私人财产。他们威胁说，谁敢动医药品、机械设备、水泥、火药等敌产，就枪毙谁。

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父亲的朋友说，弄不好会坐牢的，劝我父亲赶紧逃走。

可是，他刚从北半部逃出来，现在能往哪里逃呢？在解放了的祖国却要过逃亡生活？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

当时汉城市里传开了金日成将军凯旋祖国、要来汉城的风闻。因此全市一片欢腾，人们都欢欣鼓舞。

由各界人士组建“欢迎金日成将军筹备委员会”，由洪命熹担任委员长。每天都有几十万市民成群结队涌到汉城火车站。有一天父亲随着这个队伍去火车站，看到贴在火车站墙面上的自己照片，顿时惊呆了。那是警察局发布的关于通缉犯的公告，公告里有他的资料。公告上说我父亲是在北方的指令下秘密派来的“特工”。可见他们是处心积虑抓捕我父亲。

父亲感到很冤枉，跺脚捶胸，却无处诉苦。当时我父亲的处境，可以用“四面楚歌”四个字来形容。

有一天，父亲的朋友急忙爬到阁楼上，大声叫了父亲：“宋哥！你快下来，快点儿！”

父亲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他想，肯定是敌人打探到他的住处，抓他来了。阁楼下边人声鼎沸。父亲处于虚脱状态，被朋友搀扶下来。

当时在父亲的眼里，笑着看他的人们好像都是拿着手铐和警绳而狞笑的警察。等他回过神来一看，原来他们都有说有笑地等着平壤电台的广播。

听他们说，过一会儿就播放金日成将军的凯旋

讲话。父亲连忙坐在人们让给他的座位。

过了一会儿，金日成将军的祖国凯旋讲话开始播放了。那天是1945年10月14日。父亲屏声息气，倾听了金日成将军的广播讲话。

金日成将军在讲话中号召说，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为了建国事业积极做出贡献。

父亲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潸然泪下。

父亲每当回忆那个难忘的日子的时候都激动地说："当时我眼前一片光明，就像在暗无天日的迷失中，忽然有一束阳光照进心里一样。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的心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我的感受。我很遗憾，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当时听金日成将军的广播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喉咙梗塞，眼泪直流。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

这是打开数百数千万心窗的号召、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号召，又是照亮新朝鲜前进道路的一座灯塔。

父亲不再流泪了。"走。到平壤去。快到平壤去为建国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这样，父亲重新北上。他本来打算坐火车去开城，

但是看到乘警拿着通缉犯的照片端详每个人，就改变了主意，因为那些照片里也有他。

他改变路程，先去了江华岛。在那里，他趁着落潮的时候，渡过大海。

是什么让父亲下定这样的决心呢？我相信他肯定是听了英明的金日成将军在广播讲话里所说的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大家都奋起投入建国事业的那句话才选择了这条路。

那一天，陪我父亲来到江华岛的那位朋友含着眼泪，与父亲挥手告别。

"再见，宋哥！"

这两个朋友就这样分手，分别留在北方和南方。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可是我敢肯定这两个企业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怎样一个截然不同。

一直到临终时父亲无从知晓这位含着泪水送他走的朋友以及他在南朝鲜的那些同事们的生死与否。

如果他们还活着，能看到我的文章，他们会感怀万千地回忆父亲的汉城之行。

追随太阳

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徐徐来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父亲拼命地渡过大海。回到平壤后，重新创业。父亲的企业生涯就是从生产铅笔开始的。

他想：解放了的国家定会新办很多学校，会有很多孩子要读书。

要读书就得有铅笔。铅笔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时铅笔非常紧缺，供不应求。父亲把小小的铅笔当作秤杆，把自己的命运搭在这把秤杆上。原料材料都有，日本人逃走的时候，把大量原木扔在火车站。

幸运的事情接踵而来。父亲从火车站回来的路上赶上了一场大雨，就躲进了一个屋檐下，在那里有三个人正在谈着找工作的事。真巧，他们分别是木匠、车工和曾经在电器厂制造炭精棒的人。

父亲非常高兴："太好了！只要有这些人，现在就可以制造铅笔。"那些工人也欣然答应了父亲的邀请。

随后，父亲先在平壤市西区租了个房子，当做

工场。还买来木工车床和风机，还招募八名工人，而且从江界买来了石墨。

父亲终于生产出了第一批货——铅笔。他们在铅笔上印了"三千里"牌子。这意味着三千里朝鲜。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以虔诚的心灵制造的"三千里"牌铅笔虽然微小，但谁也没有料到这铅笔将把父亲的人生变得无比光彩。

当时，工厂的日产量只有300支。铅笔厂的消息传开了，很快有很多人来到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铅笔厂。

可是，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铅笔厂的消息传至金日成将军。

后来才得知，最先向金日成同志汇报关于"三千里"牌铅笔的人就是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

金正淑同志向金日成同志汇报铅笔厂的消息后说，她想先走一步到工厂去看看。她带着年幼的金正日同志来到了坐落在普通江畔的这家小小的铅笔厂。

我们通过那天陪同金正淑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来过铅笔厂的一位干部的回忆了解到，我父亲也没有想到刚刚投产的铅笔厂会让金日成同志感到如此高兴。

1946年2月3日，这一天是决定我父亲一生光荣的日子。

那天中午，父亲因木材运输问题正要出去一趟。当他走出厂门的时候，有一辆轿车停在了大路口。车上有一个人下来，往厂门走过来。父亲没有想到这位正是全民族敬仰的民族太阳——金日成将军。

矫健的步伐、颀长的个子、黑色的西服和大衣、炯炯有神的眼睛、容光焕发的面容、令人迷恋的笑窝儿……他的所有举止都不同凡响，而且让我父亲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父亲屏住呼吸呆呆地站着。那位客人走到父亲跟前，先问这里是不是铅笔厂。

父亲回答说：是。

客人接着问：宋大冠先生现在在哪里？

父亲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知道他的名字。

“我就是宋大冠。”父亲回答。

客人听到父亲的回答后，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宋大冠？今天见到你，我很高兴。

父亲这时才明白过来。炯炯有神的眼光，英俊的容貌，洪亮的声音，满面的笑容，高洁的人品……没错，这位正是金日成将军！

他顿时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激情满怀。金日成同志握住父亲的手时，他连一句问候的话都说不上来。他兴奋得气都喘不过来。

金日成同志说，我这是来看看制作铅笔的，我们到现场去吧。

虽说是工厂，可却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工场，只有8个工人在这里满身石墨粉和煤尘，辛辛苦苦地干活儿。

金日成同志笑容满面，朝着机器的轰隆声挪动脚步，我父亲也慌忙地跟上去。

金日成同志看了又看生产现场，过一会儿就走到工人们用刨子把铅笔杆加工成角柱形的地方说，大家很辛苦，你们制作好东西啊。

他接着问，这里有多少工人？

父亲回答，共有8人。

金日成同志又问，工厂的生产面积有多大？

父亲回答，约有350平方米。

金日成同志听了父亲的回答后，往刨槽机走过去。他看了看工人们把铅笔杆刨削成铅笔芯槽，又问，原木和石墨是从哪儿来的？

父亲回答，原木是从江界一带各地方弄来的，石墨也是江界东方矿山的。

金日成同志了解到用椴木制作铅笔杆的情况，提醒我父亲说，用红松也可以制作铅笔杆。他接着问，一天生产多少支铅笔？父亲回答，一天生产1500支。

金日成同志说，我国石墨蕴藏量丰富，利用我国丰富的原料，用我们的双手制作铅笔，这多好啊。江界的石墨最好。

他拿起一支铅笔看了看，接着说，我们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因为缺乏铅笔，游击队员只好在沙子上写字识字。铅笔是很贵重的。我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没想到会因为铅笔问题担忧，幸好听到康良煜先生的话，得知这家厂里制作铅笔，实在太高兴，所以就这样看你们来了。

他要去看制作铅芯的地方。父亲对他说，那地方太脏太乱，您还是别去吧。金日成同志说，我们是来看制作铅笔的，铅芯制作工地脏乱也没关系，我不会怪你们的。说着，他朝那里走去。

金日成同志走到焙烧炉前，工人们向他行礼。金日成同志看着焙烧炉说，要把烧煤的焙烧炉改为电炉。

他站在压芯机前仔细看了铅芯慢慢地挤压出来，对我父亲和工人们说，你们都是默默贡献的爱国者。解决铅笔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业务工作，而是建设好民主新朝鲜的极为重要的政治性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殖民奴役政策，仅在北朝鲜竟有230多万文盲。我们要教育我国宝贵的数百万儿童，亟需解决的就是铅笔问题。过去我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受尽折磨，目不识丁，可他们一直渴望能让自己的孩子手拿铅笔上学读书。这和我国农民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农田里尽情地犁地种庄稼的夙愿一样，也是我国人民深切的愿望之一。我们要实现人民的愿望。因没有铅笔而耽误教育我国儿童是不行的。

说实话，当时父亲虽然创办并经营铅笔厂，可对企业前途是缺乏信心的。

然而，金日成同志亲临工厂，评价父亲是做好

事、默默贡献的爱国者，提醒我父亲制作铅笔并不是简单的业务性问题，而是与国家的未来及兴亡有关的重大问题，还为让我父亲积极贡献于建国事业而循循善诱。

金日成同志向后期工艺场所挪动脚步。阿胶味和油漆味刺鼻而来，可是金日成同志不介意这些，走近一个正在做油漆作业的工人。

这个工人向金日成同志鞠躬行礼，金日成同志亲切地向他还礼后，看了看一大堆的各种颜色的铅笔，拿起一支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向随行人员要一把小刀，想亲自削削铅笔。我父亲立刻给他一把小刀。可惜那支铅笔因为铅芯太硬，不好写字。金日成同志亲自削铅笔，还在小笔记本里写写字后，心满意足地说，这铅笔虽然有些缺点，但这是我们朝鲜人靠自己的力量制作的第一批铅笔，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是很成功的。

我父亲听着金日成同志的这番话，泪流满面。

金日成同志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鼓励他说，有句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只要继续努力，就能制作好铅笔。

我父亲对金日成同志说，一定要制作优质铅笔。

金日成同志又问，生产的铅笔是怎么销售呢？

当时，各道的商贩纷纷来工厂买铅笔，简直供不应求。我父亲汇报了这种情况。

金日成同志听了，就问，为增加铅笔生产，国家能帮你们什么忙？

父亲回答说：我们需要一辆货车，请国家允许我们采伐江界地区的红松林，还把曾经由日本人经营的敬临洞的咸萝卜厂厂房让给我们使用就好了。

金日成同志听了父亲的请求，说，国家将给你们较大的厂房、货车和电炉等机器设备，在江界一带划出一片森林给你们采伐，还帮你们解决石墨供应问题，你只管大量制作优质铅笔就是了，你们还可以放心地做别的企业活动。

这一天，金日成同志深切关怀我父亲和厂里的工人，一一地做了宝贵的指教，过午后才离开了工厂。

我父亲站在原地目送金日成同志好久，直到看不见轿车为止。这时他的心里涌上了一股热流。

1946年2月20日金日成同志召开了北朝鲜临时人民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把铅笔问题作为第一个议程提交会议讨论。

后来，金日成同志感怀万千地回顾那次历史性会议说，要清楚地了解从解放到现在我们党为了解决铅笔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过去，我们在山里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没有想到祖国解放后铅笔竟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在解放初期，为了扫除大量的文盲，就迫切地需要铅笔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国没有铅笔厂，因此，我们在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以后，就把铅笔问题纳入头一次会议的议程提出来讨论。

解放后，金日成同志在新朝鲜建设事业的百忙之中，对小小的铅笔问题赋予了如此巨大的意义。

而我父亲恰恰注意到了这小小的铅笔。我曾经问过父亲，您怎么突然关心起铅笔来了。父亲笑着回答说："我看到钱了。"

看到钱了？从铅笔也能看出钱来？

当然，世界上没有不牟利的企业家。可是我父亲却噙着眼泪说："听到金日成将军在广播讲话里说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我忽然感到茅塞顿开，所以拼命地游过大海来了。"

1946年4月16日，金日成同志接见时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康良煜，问他怎么还没给铅笔厂配货车？即使给不了别的部门，必须给铅笔厂配一辆货车。

几天后他又召见康良煜说，今天之内必须给铅笔厂一辆货车。说着，他还嘱咐康良煜给我父亲带话，要好好经营工厂，提高铅笔质量，增加生产。

这样，金日成同志亲自采取措施，给我父亲的工厂提供了慈江道五佳山林地、一个石墨矿和新货车，还为企业保障全部出资。

我父亲经营铅笔厂只不过是为了赚钱，充其量也只想过把部分利润上缴国库。其实，离开钱，我父亲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

可是，金日成同志接见他、信任和器重他，从此他从一个只认钱的企业家变成了具有民族良心的爱国企业家。他展望着辉煌的人生目标，踏上了宽阔而平坦的人生道路。

不多久，坐落在普通江畔的平壤铅笔厂就门庭若

市，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人买铅笔。听说当时都来不及把铅笔送到商店。那些人用包袱、背囊和箱子买走了铅笔后又来购买。铅笔产量与日俱增，每天生产的铅笔就堆积如山。随之，钱也赚得越来越多。后来父亲把这家铅笔厂移交江界市，因为木材和石墨等原材料都是从江界运来的，所以从国家利益出发，他就把工厂搬到本地。

之后父亲就开始经营了玻璃产品和橡胶产品生产企业。他知道金日成同志特别担心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玻璃产品和鞋履等紧缺日用品问题。

这样，父亲先后创办了玻璃厂和橡胶厂。虽然是很陌生的行业，但是他录用经验丰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大搞生产。他这次也发了大财。

这一切都是在前面说过的那些迫切需求带来的。有需求就能赚钱，有钱就能赚更多的钱。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产量增加，需求也跟着增多。父亲算是坐在钱堆上了。

这么多钱会不会再次使他财迷心窍、败坏名誉呢？这些钱会不会又使父亲旧态复萌呢？

果然有些人来找我父亲。有的人还带着介绍信来，邀请我父亲去南朝鲜，去汉城。他们说，你不用担心以前那些美军政厅的逮捕令，那都是因为一个心怀鬼胎的小人告密而引起的误会，宋先生去南朝鲜，肯定会成为暴发户，我们携手大干一场吧。

可是父亲嗤之以鼻，明言推辞了。因为有一个世界吸引着他。这是一个伟大的关爱和信任的世界、应当结草衔环的道义的世界。

于是，父亲在严峻的战争年代也毫不动摇。严峻的战争最终考验了他。

敌机的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暂时的战略撤退、敌人的野蛮屠杀……

无论他是宗教徒、企业家还是医学家，凡是具有民族气概和良知，支持共和国的人，敌人就一律逮捕和惨杀。有时候，敌人对人们说，只要说一句反对共和国的话，就可以让他继续活着。那是考验信念和道义的艰难时期。看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富贵荣华，另一条是死亡。

但是，父亲并不认为选择祖国就等于选择死亡。

他坚信，只要有伟大的金日成将军在，我们必将赢得胜利。为了拥护金日成将军，为战争胜利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就拼了命。他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大量购买粮食，支援了军工厂工人和战争难民。

为了不让玻璃厂停产，他在轰炸中也始终不离开工厂。这样，玻璃厂生产了前线所需的各种注射器、注射药瓶和数百万个灯泡；橡胶厂大量生产鞋履等橡胶制品。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父亲把橡胶厂搬到了开城。

父亲解释其理由说："我就是想让敌人看看工厂烟囱里冒烟。我就是想这样高喊：你们看吧，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我们共和国在废墟里也照样活着、呼吸着。你们看看这股浓烟吧！"

这样，战争烈火燃遍全国的那时候，这家橡胶厂烟囱里不停地冒烟，显示着厂里的生产活动持续不断。敌人看到这一情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父亲把这一事实当作他一生中最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每当父亲讲起那时候把橡胶厂搬到开城，从而烟囱里冒烟的故事时，他总是紧握着拳头，激昂得大声说话。

我从未见过那家橡胶厂冒出黑烟的情景。

不过我可以想象出我父亲在钱垛上点燃信念之火的样子。曾经的私营企业家——我父亲变成了不图盈利只图国民精神意志的爱国工商人。战争结束后，父亲把那家橡胶厂移交给开城市人民委员会。父亲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当时我真是不知疲倦地干活。" 父亲说。

"只要有金日成将军在，我们必将胜利。我们坚信了这一点，所以干起活来劲头十足了。"

战争时期，父亲调拨巨额资金购买大量的粮食和被服支援前线，还以支前金的名义把很多资金捐献给国家。

下面是当时的捐献单。（以当年的货币价值计算）

1950年8月	30万元
1951年12月	35万元
1952年12月	150万元,
1953年4月	300万元,
累计	515万元

对我父亲的爱国表现最欣赏的人正是金日成同志。1953年8月有一天金日成同志再次接见了我父亲。

我父亲郑重地鞠躬行礼，金日成同志握住他的双手说，战争期间你太辛苦了，听说宋大冠同志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捐献了数百万元的支前金，你真是做了一件好事。

父亲听了金日成同志对他的高度评价后不知所措。金日成同志亲切地笑着问我父亲，在极为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你为什么每年捐献了那么多支前金？

我父亲就对金日成同志说出了在严峻的战争时期一直怀在心里的坚定信念："金日成将军，我认为有祖国，个人的财产才能发光生辉。沦为亡国奴，即使有万贯家财，它还有什么用呢？"

金日成同志听了父亲的回答后，心满意足地说，由于有宋大冠同志这样的爱国企业家和全国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积极支援了战线，所以我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后来我父亲说，当时他的感受是好像获得了整个世界一样。他激动得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岂能不激动？他是得到了全世界。他用爱国的心换来了万贯金钱也买不到的伟大的关爱和信任的世界。

虽然他没有把自己找到的这一人生真谛公诸于世，可是我作为他的女儿，如今替父亲大声宣扬。

二、不要回头望

世上无易事，只是看你如何努力罢了。勉强或者被迫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多么容易，都觉得是一种苦差事。与之相反，愿意做的事，无论是多么苦，也不会觉得累。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不知道我选用“热爱”这个词是否适当，但我还是想这样表达。如果你热爱工作，就不会觉得累。

“不要说累！”我从小就听惯了父亲的这句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记得好像是在我8岁的时候。当时，父亲让我跳一年级，在国内仅有的平壤艺术学校舞蹈班学习。

当时，我们艺术学院学生也都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光荣的我们祖国》协助演出。著名的舞蹈家崔承喜辅导我们。她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我们一整天跑来跑去，最后都累得大汗淋漓、蔫头奔脑。每当这样的时候，父亲就像副歌一样反复地说“不要说

累”。这也许是总结父亲的人生经验和教训的一句话，和众所周知的一句话“不劳动者不得食”一样。

其实，父亲很爱工作。只知道工作是不是等于最爱工作？现在，我写着这篇文章回想起父亲的一生，觉得在他的人生中最严峻的时期是战争时期，而最困难的时期则是战后时期。

命运的转折点

三年战争的烈火燃遍全国，举国上下变为废墟。父亲经营的工厂也遭到惨重的破坏。

当时的父亲，凑凑砖头砌墙壁，垒烟囱，盖房顶，抹墙面，恢复厂房，都不是问题。最紧要的是复原机器设备，可是全国的工厂企业都被破坏，弄来一台发动机和电动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这时候，父亲与众不同的企业头脑又发挥了作用。他打听到战争期间有几艘敌军舰被击沉于元山前海，就天天去大同江练了潜水。他带着饭，从早到晚在水里游泳。

当时整个平壤市里充满着重建热潮，建设者们背着

满架子砖头跑也不觉得过瘾。就在这样的时候，有声有望的厂主整天在玩水，人们会怎么想？他们都以为我父亲以前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现在肯定发疯了。之前邻居们见到他都热情地打招呼，可是这时见到他都远远地躲开。

过几天，父亲又弄来了怪怪的东西。那个东西像是故事里听过的古代武将头盔，除此之外还有带水鞋的橡胶服。他带着这些沉重的东西在大同江畔走来走去。

流传了种种风闻。有些机灵鬼说，战争时期宋大冠悄悄地把黄金掉进大同江水里了，现在他在玩水是为了找那些黄金。企业家宋大冠在大同江和普通江的汇合处藏匿了数十公斤黄金的风闻，闹得满城风雨。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父亲练了15多天潜水后就去了元山。读者会质疑，他找一个潜水员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自己活受罪呢？

理由很简单。父亲作为企业家，向亲眼确认那艘战争时期沉入大海的军舰里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值得捞出来。他在元山前海又辛苦了15天。他潜水不是内行，有时他的耳朵里流出了鲜血。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找到

有用的设备，确定了其位置。然后调来几艘机船，动员了一些潜水员。在捞上来的东西中，最大而最值钱的就是发动机。

为了安全搬运这些东西，他从元山徒步走到平壤。他制作一根长尺当拐杖用，因为他要亲自了解从元山到平壤的路况，一一地测量所有隧道的高度。

他把卡车车厢的高度（因车类不同）、设备高度（主要是最大的发动机）、每个隧道高度，都记在笔记本里。结果，只有两个隧道高度不够，所以他选了一个合适的车辆，调节了垫木的高度。

这样，他走了数百里路到达平壤。鞋烂脚破，嘴唇干裂出血，胡须长得像鞋刷。这样的面貌给人们带来了第二次惊讶。他的外表那样的褴褛不堪，还面对着人们哈哈大笑，人们不吓死还怪呢。

他千辛万苦运过来的机械设备，当时是很难找到的，价值连城。工厂很快恢复，父亲的企业迅速发展，超过了从前的生产水平。赚了很多钱，那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强调一点：在战后国家经济情况很艰难的

时候，私营企业家赚了钱，就说明他对改善民生和恢复经济有所帮助。可是有些人却没有这么想。

当时正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搞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大部分企业家和商人想方设法侵害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先到农村去廉价收购水果和肉类，然后高价贩卖；有些企业家没有把产品出售国家，反而给商人高价销售；甚至有些企业人与政权机关的异己分子狼狈为奸，损公谋私，还另作秘密账本，欺骗国家，减租偷税。他们利用价格杠杆投机倒把，拒不加入生产合作社。

1956年4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根据革命发展的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些人戴着有色眼镜注视父亲的私营企业活动，可不是奇怪的事情。他们想，宋大冠从解放初期起比谁都受到金日成同志的恩情，应该带头拥护劳动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带头加入生产合作社才是，可他还没这么做，真让人无法理解。

金日成同志听了这些事实，1957年10月中旬派一位党中央委员会干部到我父亲经营的工厂去了解情况，听

到他的汇报后作了如下内容的教导：

……他本应率先加入合作社，却还在经营私企，对此有些人可能会产生疑问。战后我们党加紧进行农村的合作化，同时促进了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个体工商业者与农村的个体户有所不同，种类多种多样，从事各自行业，个人成分都不同，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水平大有差别。因此，我们党不得不根据我国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把生产合作社规划为三种类型。可是，宋大冠不能加入第一类和第二类，也不能加入第三类：第一类是主要由贫困的手工业者组成的合作社，可是宋大冠拥有一定财产，因此对他不合适；第二类是半社会主义形式，一方面按劳分配，另一方面还按出资额付酬，所以给宋大冠的分配额肯定比空手加入合作社的人多得很，凭他的良心是不能这么做的。还有，第三类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应该把生产资料和资金都归合作社共同所有，只做按劳分配，因此没有从政治上充分准备的个体工商业者不敢一开始就加入这一类合作社。宋大冠是能直接加入第三类合作社的，可是他一个人是搞不了合作社的呀……

金日成同志接着说，我们党提出合作化方针时，宋大冠就提议要把自己的个人资金和生产资料全部缴纳国家，可是考虑到这对其他工商业者产生压力，所以让他暂时继续经营私企，还做好必要的准备，一旦实现高级的合作社类型，就经营较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他还高度评价我父亲说，宋大冠在战争时期生产注射器和安瓿等，保障战争需求；在农村引进稻米冷床育苗方法时，修建造纸厂生产供应苗田用油纸；还生产各种玻璃制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那位干部给我父亲传达了金日成同志的话。父亲想，他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搞企业，是多么幸福的，下定新的决心："我曾经决心做一个'有钱人'，为建国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可是我现在不仅成了'有钱人'，还成了'有力人'。我经营工厂经营得越好，就能遵循金日成将军的意旨做出越多的事情。再加一把劲儿，干活，干活，再干活。尽早组建合作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父亲组建了平壤工业品生产合作社，后来把组建合作社时出资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捐献给国家。

这样，父亲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从一个私营企业家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从此献身于祖国与人民。可是，这一大步并不是毫无曲折、一帆风顺的。其实，他把500万元出资额全部捐献的时候考虑了很多。那笔款可是父亲的全部财产。

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分钱，统统拿出来捐钱。他曾经捐献数百万元支前金时，为新的企业留过本钱。而现在他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私企活动告终，所以不需要私营企业的本钱了。

不过，他有七个孩子，作为父亲，怎么会不为自己孩子着想呢？难道留给他们一些财产不行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儿女成家时需要家具和厨具。做父母的，谁不想给儿女筹备这些东西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再说，这样做也是无可非议的。

1959年10月中旬，在金日成同志的莅临下举行了全国地方工业部门及生产合作社积极分子大会，我父亲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在发言时吐露了自己的心情："我身为管理委员长，白天去合作社搞社会主义，而晚上回家则为数百万元出资额苦思冥想，搞了资本主义。可是

现在把那些钱都捐献给合作社，压住我心的千斤负担一瞬间就消失了。”

金日成同志听到父亲的发言，大笑着说，宋大冠把出资额捐献给合作社，是很好的事情。

说完，他最先为我父亲鼓掌。全场掌声如雷。这掌声就是对父亲走过来的爱国之路的由衷的赞赏，也是对他将来的人生道路的祝福。

他再苦再累也不觉得累。他总是跟儿女们说：“你们都热爱工作吧。如果真心爱就不觉得累。你们不要说累。”

父亲就是这么工作的。他交出自己挣的全部钱财，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良心。不为荣誉，也不为职位，而只为祖国和人民诚恳（勤勤恳恳）地、坚持不懈地工作。

于是，很多人曾经认为是一个清算对象的资产家、私营企业家——我父亲获得当上朝鲜劳动党党员的宝贵荣耀，也就是说，曾经的企业家变成爱国者。

在人生的黄昏期

1961年，由父亲担任管理委员长的合作社改编为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专门生产镜片、镜头和玻璃制品。

1969年3月初，金日成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打电话说，现在很多老党员想看书看报，但没有老花镜，而且也没有生产和销售老花镜等眼镜的单位。你到平壤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去了解一下他们能生产多少眼镜和老花镜？要想生产眼镜都需要什么东西，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了那些问题以后又能生产多少？

那位干部给我父亲传达了金日成同志的话。父亲听了，深感金日成同志的热爱和信任，热泪盈眶，同时又自责了一顿。因为他的合作社名为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应该关注人民亟待解决的眼镜生产。可是一直自以为在需求方面比谁都敏感的父亲，居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都大量生产汽车、拖拉机、推土机、掘土机和电机车，争先恐后地摧毁陈旧而狭小的工厂正门，重新做更大更广的大门。熔炉里烧开铁水，

大海上出现很多新渔船，数千吨级冲压机震天动地……

可是，没有人关心像眼镜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

父亲听了金日成同志的教导，才意识到自己的准备程度远远达不到金日成同志的崇高意图，就拍了拍自己的胸膛。父亲在随身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金日成同志关于为人民解决眼镜问题所作的教导。

这一教导凝聚着金日成同志真心为人民着想、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和人民同甘共苦的仁慈的形象、伟大的风范和恳切的嘱咐。父亲把金日成同志的教导铭刻于心，日夜奔跑，购买设备，招集技术人员。

这样的时候，金日成同志给他提供了能干的技术人员和宝贵的设备。这次新企业的基石也是金日成同志给他打造的。

父亲信心十足地展开生产活动。那时候，他忙得连自己最疼爱的老闺女的将来问题也顾不上了。

前面我已经提过父亲偏要让我这个老闺女成为艺术家。听说他曾经想象过我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在大剧院舞台上像蝴蝶一样跳舞，还在热烈的掌声中鲜花满胸膛的样子。然而，我越来越长肉。

有一天，父亲去过我的学校，这时他才得知老闺女成姬不是当舞蹈员的料。之后，他把我安排到音乐班。

他还每天晚上专门请来国立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李永秀（当时在朝鲜最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给我做家教。父亲对老闺女一向是这么积极。可是，这会儿我快要从平壤艺术学校毕业了，他却忙得顾不上我。

会不会是因为我受过家教，所以他对我的大提琴演奏水平很放心？

有一次他心不在焉地问我：“你要考音乐大学了吧？”

我摇头回答：“不，我不要。”

我想这个回答对他来说应该是出乎意料的。可是，他并没有吭声。我估计他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当时他为完成年产100万副眼镜的生产目标而夜以继日艰苦奋斗。他一心一意只想着眼镜生产。我想他大概是把我说“不”听成“是”了。

只要是金日成同志所希望的，他一向全心全意地去实现，其余的就什么都不顾。何况他的心里充满着朝鲜劳动党党员的荣誉呢。

过了一个月，他才问我上大学情况如何。不过，他

这次也是边在自己的随身笔记本里写着好多数字，边随口问我而已。我说，还可以。我的回答明明是不明不白的，可是父亲并没有追问我，只是接着写自己的。

又过了一个月。（也许是过了更长的时间。）

这时候父亲的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把100万副眼镜生产目标快要完成了。父亲这时才了解到我上牡丹高等医科专科学校的事实。我想他是大吃一惊的。

“你不上音乐大学？大提琴呢？”

我笑着跟他解释换了专业的理由。这简直是令人可笑的怪理由。“你想想，我成了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到国外去表演后回来，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夹在亭亭玉立的女演员中间，从扶梯走下来的样子，可好看了吧。我一想就起鸡皮疙瘩。”

父亲听了我的回答，无可奈何，“呵！”古怪地苦笑了一声。他砸着嘴说：“这么说，你们都学医啊。”说完，父亲又去了工厂。

因为厂里为了贯彻落实金日成同志的教导而热火朝天，他没有功夫和我闲聊。他们终于完成了100万副眼镜生产目标。

金日成同志听了有关眼镜生产的汇报，高度评价他们，并给他们表示感谢。那一天父亲跟我们说：“眼镜可不是什么大东西，也不是贵重品。可是金日成同志却把它当作宝物。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亮了。因为我从普通的玻璃片里看得出为人民着想的大爱。”

过了十年，我也从事眼镜行业，常常想起了那天父亲说的玻璃片和大爱。我想，父亲的意思是金日成同志启发他拥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雪亮的眼睛、党员的眼睛。

过去父亲的人生是被钱束缚的，而今天是毅然走上爱国之路。曾经只认钱的那双眼睛，今天在金日成同志的引导下变成了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党员的雪亮眼睛。父亲在伟大的关怀下迈出矫健的步伐，自豪地装点自己的后半生。

有一天，父亲忽然回家了，看起来是很兴奋的样子。当时正是我人生的第十九个春天，高等医科专科学校毕业在即。我正在家里埋头学习呢。

我问父亲怎么回来得这么早？父亲说，他到厂里去，顺路回家来看看。说着，他竟然请我弹钢琴给他听听。

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跟哥哥们一样选择了学医之路后他第一次要我弹钢琴。

我坐在钢琴前，想了一会儿，为了让他快乐，就弹起了贝多芬的《给爱丽丝》。

可是父亲摇摇头，表示不太满意。

“对了，爹是喜欢民谣的。”我心里这么想。

我弹起了《阳山道》。可是父亲又摇了摇头，然后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看来他是要平心静气的。这一下我就拿着大提琴，默默地看着闭上眼睛的父亲。

这时我想父亲是不是硬忍着眼泪？依我看，他内心很激动。

我问：“父亲，您有什么事了？”

“嗯，有事了。”父亲好像喘不过气来。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今天，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交给我，交给你爹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爹啊。他相信我，就……”

“啊，原来是因为这事！”我想。

父亲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年老病弱的父亲，这时是因为这份激情满脸红光。

他喘了一口气，低声说道：“成姬，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歌吧？‘晴天早晨，满天红霞’那首歌。你给我弹弹。”

对呀。他就是想听《竭尽忠诚，代代相传》这首歌曲。我调了音，在弓毛上摸了松香，然后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父亲把头轻轻放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我看到父亲的两眼里流出了泪珠。我也是不由地热泪盈眶。我轻轻地划起弓来。

晴天早晨，满天红霞，
仁慈容貌，浮在眼前。
静静夜空，满天星笑，
让我怀念，温暖关怀。

父亲掉了眼泪，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唱起这首歌来，不仅是我们，我国人民都感动得掉眼泪。一想起金正日同志的慈爱的微笑，所有人都感激不尽。父亲现在是在心里唱着这首歌掉眼泪的。我也是沉浸在父亲内心中沸腾的幸福感之中。

歌曲弹完了。父亲依然静静地坐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把他那大大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金日成同志一直抬举我，信任我。如今，金正日同志也如此信任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的恩情。我得走了，要去工作。从今天起你们别等我回家了。"

说完，父亲就去了工厂。

父亲接到什么重任，令他那么兴奋呢？

其实，某一纪念碑式建筑建设工程正需要玻璃装饰品，玻璃材料必须是高品质的，而且需要高精密生产工艺，所以不少干部认为进口是最好的办法。在我国生产这种装饰品毕竟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如果耽误了时间怎么办？其结果是影响建设期限！他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纷纷建议要从国外进口这些玻璃装饰品。

金正日同志听到汇报后说，这个任务交给宋大冠同志的平壤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吧。他从解放初期直到现在，只要是金日成同志交给的任务就没有一项完不成的。

世上哪有比这更大的信任。金日成同志曾经一直信任他、关爱他、引导他。如今金正日同志如此信任他，使年迈力衰的父亲返老还童了。

过早袭来的病魔也烟消云散。他的全身复活了热血沸腾的青春。他重新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这一年的春天是我人生的第十九个春天，而对我父亲来说是第六十二个春天。有句话说，树大空心，可是父亲在62岁时重新迎接了人生的春天。金正日同志的怀抱简直是让枯木逢春的太阳的怀抱。

正因为如此，父亲这天含着眼泪听了这首歌。只遗憾我的文笔拙劣，无法生动逼真地形容那眼泪蕴含着的喜悦和幸福——我父亲当时的心情。

父亲热情充沛地投入玻璃珠生产工作。他和工人、技术人员聚首一堂专心设计，还用手摸、用锉刀磨，夜以继日地开展制造工作。于是，他们圆满生产10万个玻璃珠，使建筑更加富丽堂皇。

不仅如此。每当仰望主体思想塔时，我都感到很自豪，因为这座塔里也凝聚着金正日同志对我父亲莫大的信任。主体思想塔的大型火炬常年四季熊熊燃烧，照耀四方。

本来，有些干部想把火炬的钢化玻璃生产任务交给一家玻璃厂。可是那家工厂无法担当此任，因此他们打算从国外进口这种玻璃。

但是，主体思想塔是将世世代代发扬光大金日成同志创始的主体思想的大纪念碑，这座塔的火炬玻璃怎么能用进口货？

金正日同志这次也想到了我父亲。

于是我父亲承担了主体思想塔火炬的透明钢化玻璃生产任务。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父亲已过了古稀之年。这样的他今天又接到了金正日同志交给他的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主体思想塔的形状是一把巨大的火炬，玻璃火炬就相当于5～6层公寓的高度。对我父亲的生产合作社来说，生产那种透明钢化玻璃难度很大，产量也有限。

其实，当时国内还有南浦玻璃厂，该厂的生产设备齐全，大型玻璃生产能力很强，生产规模与我父亲的平壤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是无可伦比的。

可是金正日同志相信我父亲，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平壤光学玻璃生产合作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一定做到！”

但是，如果没有按期完成任务怎么办？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回答得这么痛快，很多负责干部为他担心，或许他们觉得我父亲这是自不量力。

来找父亲的人络绎不绝，爹爹总是一个回答。

“这不是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嘛，非要做到！”

父亲和工人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干活。那时候正是足球赛季，甲级联赛盛况空前。其实，父亲是只知道工作的人，他只有一个兴趣，就是足球。这不是说父亲足球踢得很棒，他根本不会踢足球。

有一次，单位里在节日那天出去野游，进行点球比赛：一个人踢球，一个人守门，决定输赢。

在草坪上搭了个球门，在5米之外踢点球。第一轮是管理委员长——我父亲踢球，合作社党书记（时称）防球。

很多人以为父亲是个足球迷，踢得应该很棒。可是看了父亲踢足球的样子就乐得前仰后合。

他把球踢得太使劲儿，皮鞋头踢进了土层，扬起一团尘土，球却达不到5米之外的球门……

党书记的嘴里进沙子，捂着嘴转来转去。从那以后，人们给父亲加了一个外号“足球管理委员长”。他是足球迷，要是合作社的球员没得到冠军，就不让他们进工厂。有一次他说是去参加重要的会议，却去看了足球决赛。那时候恰恰直播了那场决赛，厂里的人们在电视里都看到坐在观众席的我父亲。父亲喊加油喊得很热烈，摄影师就好几次把摄影机转到了父亲。

父亲很欣赏足球猛烈的攻击精神、耐力和斗志。父亲看着球员们坚持不懈地奔跑在赛场，可能发现了自己跟他们同样的气质。

但透明钢化玻璃生产期间，父亲连一场足球赛也没看。准确地说他根本就不想看。像我父亲这么狂热的足球迷，听到有足球比赛的消息就摆手说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没看见我也正踢着球吗。现在呀，就等踢球进门了。”

父亲终于把球踢进了门。（这是第九次试产。）父亲成功了，他终于研制成功应力分布均匀的透明钢化玻璃。

把网球那么大的玻璃球（900克）从102公分的高处坠落也没掉碎，连像蜘蛛网那么小的缝隙也没有产生。

接着，把1平方米的面板玻璃放在两块砖头上面，体重七十公斤的人站在玻璃面板上，玻璃没压碎。再让一个人站上去也一样没事。最后父亲也跟着上去，才有裂缝之声，他就下来了

向金正日同志汇报了这一消息的那一天，父亲同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站在一起合影留念。

父亲本来不喜欢拍照，因而一向回避那些摄影记者。

但那天，他回想着合作社为主体思想塔的火炬而付出的努力，怀着自己一生的总结——蕴藏在主体思想塔永恒的烈火中的自豪感，留下了那一张照片。

父亲常跟我们说：“如天如海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说着，他噙满泪水。

如今，我深有感触地看着每座纪念碑式创造物的一个个玻璃珠、吊灯和玻璃方块。每当我仰望主体思想塔的火炬时，心里不禁感到热乎乎。

我想放声呐喊，父亲的一生是值得自豪的。

三、光荣的人生

有一年，一些海外侨胞工商业者见到我父亲，问道：“宋大冠先生，看来你真是幸福的人。凡是企业家，一时也没法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你怎么过得这么明朗、这么开心呢？”

父亲首先说了一个幽默。他说，古人说，人有两眼、两耳、两手和两脚，这都有奇缘：一眼看真，一眼看假；一耳听言，一耳弃言；一手给，一手收；一脚站着不稳定，两脚相依为命。

那些人听了，都愉快地哈哈大笑。有人问：这话不像是古人说的，是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是不是说给我们企业家听的？

父亲笑着回答：

“无论是哪个时代，企业家的命运好比是风中之烛，随时可能消亡，因而他们总是忐忑不安，一刻也放不下心。而且为避免上当和受人指责一直神经过敏，还为获得可靠的同行尽心尽力。所以，你们说这个两眼、两耳、两手和两脚的故事是说企业家的，这也不无道理。

“可我呢，完全不会被人受骗，因为我就在社会主义祖国进行企业活动，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母亲是不会骗自己孩子的。我的祖国怎么会欺骗我呢？

“我又完全不会受人指责，因为我的企业活动的宗旨就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带来更多的利益。

“还有，我愿意挣得更多，而且我不会倒闭。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像风中之烛那样随时可能消亡，为之焦急和紧张，因为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循循善诱地引导我的人生。

“如果父母牵着手，孩子走路永远不会摔倒。我一辈子一次也没有摔倒过，一直顺利地走过来。”

接着，他详细地叙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引导一个碌碌无闻的私营企业家，把我培养成为爱国者、党员。就在这样的关怀下，我过上了光辉的生活。结果，我不仅赚了百万钱财，而且用那百万钱财服务于祖国和人民，得到世上任何企业家都得不到的人民的爱护，也获得和享受了用亿万钱财也无法换来的光荣和幸福。

海外侨胞工商业者都为他鼓掌。他们都激动地说，宋大冠先生才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百万富翁”，是一位同时拥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社会主义朝鲜的“百万富翁”。从此，父亲被称为“社会主义百万富翁”。

不过，对他的关爱和信任、他的幸福和无限光荣不止于此。

父亲年过七十，就担任了合作社顾问一职。这是可以边休息边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帮助合作社工作的职位。

可是，他却不只是在后面提提建议，而是站在集体的前列，奋勇前进。离开了工作，他不是我父亲。

他每天怀着自个儿的想法到工厂去，默默无言地下班回来。

可是，金正日同志没有忘记我父亲。他听到关于我父亲的汇报后说，让他重新担任管理委员长职务。

那天，父亲从戒酒以来第一次拿起了子女们敬给他的酒杯。我至今难忘父亲用颤抖的手拿起酒杯，望着我们七兄妹和孙子孙女，热泪盈眶。

当时父亲74岁了。他没有遮掩自己流泪。又何必呢？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滴滴落在玻璃杯里。他把酒水和泪水一起喝下去。

过了几天，父亲的脸色很沉重，突然对我们说：“虽说老马识途，可我回顾了我的人生，才知道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感到很惭愧。我没有培养一个能继承父业的……”

父亲的话让我们惊心动魄。当时我首次对我为当医生而骄傲的事感到羞愧。我扪躬自问，我选择的医生这个职业是必须由我担当的吗?

我有没有这样想过：我是女儿，而不是儿子，所以没有义务继承父业。

可是，这不只是义务，而首先是有关良心和道义的问题。

我想，父亲是希望我们七兄妹当中能有人接他的班。

父亲肯定是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也要世世代代报答他一辈子得到的关爱。

我终于下决心，当了一名维修眼镜的工人。我把我的决心付诸实践并不容易，为之整整花了几个月。

以前大家管我叫“医生”、“宋大夫”的，而现在我却成为一名牡丹便民生产合作社员工，与钢笔维修工和刻章工（这些都是男人）混在一起，用钳子提着玻璃片做加工，维修眼镜。

很多人都很吃惊，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有些人很同情地看着我，好像看一个挨了罚的人似的。

没错，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嘛。再说，我也不是那么容易下决心的。

父亲对我的决心感到满意、感到高兴。他对不了解我心情的那些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成姬做得对，别烦着她。”

我当了3年的眼镜工后，终于打算独自开办一家眼镜修理店。父亲这次也第一个支持了我。

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决心。”

我自己准备材料，也请来了木匠和泥水匠。晚上我一个人守在这套房子里，为下一天的工作做了准备。我终于装修好我的修理店，在新粉刷的墙壁上挂起了一个朴素的牌匾，上面写着“凯旋眼镜修理所”。

后来的三年期间，我们修理店给全国各家工矿企业、科研机关和新闻出版机关的工人、农民、科学家、教师、记者和公路管理员修理和提供了几十万副眼镜。

金正日同志高度评价我们，还为满足人民对眼镜的需求，指示在风景秀丽的牡丹峰山脚下开办眼镜商店。

如今，不仅是我国人民，而且外国人都常常来找我们平壤眼镜商店，海外同胞也给予慷慨无私的援助。要讲我们商店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其实，我们做出的成绩很少，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我父亲在金正日同志的关爱和信任下，74岁那年担任了拥有几千名员工的大企业管理委员长，热情充沛地坚持工作，一直工作到八十多岁。

父亲在首都平壤和全国各地留下了人生的足迹。

我父亲经常说一句话：“社会主义真好！”

在看到普通工人搬进新大街的住宅时、在看到孩子们在苍光院游泳池戴着水镜戏水的样子时、在乘坐地铁时，他常说：“社会主义真好！”

这应该是父亲对他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致谢、一种赞叹，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骄傲。因为他的人生是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温

暖怀抱里发光生辉的，在家家户户充满幸福的窗户玻璃上、玻璃珠和眼镜上都渗透着他那引以自豪的人生。

可是，那时候父亲的病情日趋恶化。因为他已经八十高龄了。“健康”一词已远远地离开了他，重病侵入了他那年老的身体。

当时我出席全国共产主义美好风尚先进分子大会。父亲躺在床上通过电视看到出席大会的女儿。

大会结束后，我就跑到父亲那儿去了。父亲好长时间握着我的手，眼角湿濡，声音也因激动而嘶哑。

“你又一次让我为你骄傲。好多人打来电话，羡慕我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听说你是一级国旗勋章受勋者名单中的第一个。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女儿随了我。”

父亲抚摸着我的一级国旗勋章说：“你要明白这是多高的评价。这是金正日同志表扬你工作得好、希望你今后做更多的事。你可不要忘记。”

接着，他让我赶紧去继续搞好工作。他说，你在大会上都发过言，老缠在我身边是不行的，我也早点恢复健康出去工作。

可是终于到了父亲再也不能工作的那一天。

第二年1月，父亲病倒了，奄奄一息。外边正是三九寒天。我看着父亲惨白的脸色、深陷的眼窝和失神的眼珠子，预感到父亲已到了临终的时刻。然而父亲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们都回去干活吧！快点！”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临终的时候谁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妻子和子女陪在身边？

父亲岂不愿意子女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因为是只知道工作的人，因为更愿意孩子们在报答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关爱和恩德的路上替他做出更多的成绩，所以就不让孩子们陪着他。

记得我婚礼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做的。那天很多人喝着喜酒，祝我们生活幸福、白头偕老、多生孩子。在满堂热闹的时候，父亲却说：“明天你得上班！”这话让在座的人都很尴尬。

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默默地走出来，去自己的单位。当我们再次接到联系，跑到父亲跟前时，他快要不行了。他用目光叫我们凑近身边。我们大家静静地坐在父亲的床头边。

父亲用清晰的声音对我们说：

“如果没有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关爱，我只能是一个只认钱不认国家和民族的守财奴。金日成同志说，要和我一起迎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我的寿命不够，没有跟随他走到底，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按照他的意旨生活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父亲就这样走了。一直为赚钱而奔跑的人、曾经的一个私营企业家，竟然成了懂得热爱祖国与民族、爱戴领袖的革命者，成了得到任何企业家都得不到的人民的爱护和领袖的器重，享受了用亿万钱财也无法换来的人生光荣和幸福，被誉为“社会主义百万富翁”。

常言道，活到老懂到老。父亲因没有报答好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关爱和信任，临走时为此感到遗憾。

然而，伟大的阳光、伟人的关爱继续照亮着我父亲。这是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料想到的。

金日成同志接到宋大冠与世长辞的噩耗，不禁哀痛，以自己的名义向父亲的灵前送来花圈。

金正日同志为永远传颂我父亲为祖国和革命所建树的功劳，采取措施把我父亲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

我们都哭了。来吊丧的人们也都禁不住流泪。父亲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预先都看好了墓地，可是金正日同志却如此高度评价父亲为祖国和人民所建树的功劳，让他登上了光荣的最高峰。

出殡的时间到了。国家吹奏乐队演奏了挽歌。好多轿车跟在灵车后面。

我跟着这一严肃的丧礼队伍，看着要安放父亲的山岗。父亲在伟大慈父的关爱下，正在登上永生之巅——爱国烈士陵园。

我的父亲登上了这座永生之山岗！如果没有太阳的光芒，他只能是一个被金钱所束缚的私营企业家，他的人生也只能遭人唾骂。而他现在却成了爱国烈士，正登着光荣的高峰呢。

我抱着父亲的灵柩哭着叫他：“爸，您知道吗？知道您现在去哪儿吗？啊？您在爱国烈士陵园啊！您听我说，爸，您快睁开眼睛看看。请睁开眼睛看一遍。爸！”

虽然是三九寒天，可阳光依然是那么温暖。皑皑白雪覆盖着爱国烈士陵园，耀眼的阳光温暖着大地……

结 束 语

我父亲宋大冠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从未失足，走过了一条爱国之路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终于登上了光荣的最高峰。

我父亲生前光荣，死后也光荣。

1998年9月，金正日同志跋山涉水视察前线部队。在回来的路上，他想看看忠心耿耿拥护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党而奉献一生的烈士们，把车停在爱国烈士陵园。

金正日同志一一察看石碑上的照片，回顾他们的生平，高度评价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看了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

金正日同志看到昔日的企业家——我父亲的照片时说，他是金日成同志熟悉的爱国工商业者，宋大冠同志做了很多事。

金正日同志瞻仰爱国烈士陵园的消息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广泛介绍。我们七兄妹听到这一消息后，就捧着鲜花去瞻仰了爱国烈士陵园。

我们首先沿着金正日同志走过的路程挪动脚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职位工作的领导干部、为建党建国建军事业建立殊勋的干部、为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奉献一生的烈士、科学家和在文艺部门建功立业的著名人士……他们的名字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有些海外侨胞说，烈士陵园里安葬着“长官大人”。然而昔日的私营企业家——我父亲也安葬在这座“永生之山岗”，这一事实更让人激动万分。

我们走到父亲的石碑前。父亲以严肃的表情看着我们。

我献了一朵花，久久地看了看父亲的照片。

“爸，您在想什么呢？”

我和父亲说了心里话。我还听得到他对我们的恳切嘱咐：“成姬，我再三嘱咐你。你要替我好好儿拥护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你一定要世世代代报答他的恩情。还有，你要记住，只要是诚心诚意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人，都可以在金正日同志的怀抱里享福享乐。”我想，父亲肯定是这么说的。

我坚信，凡是瞻仰爱国烈士陵园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会领悟到这一铁的真理。

一位企业家的人生转变

作者：宋成姬
编辑：尹永日
翻译：张金哲　白学成
出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文出版社
发行：主体110(2021)年8月

E-mail: flph@star-co.net.kp

http://www.korean-books.com.kp


ISBN 978-9946-0-2029-7
9 789946 020297 >